

杨官寨中美田野考古培训班的探索与成就

杨利平

20世纪末至新世纪初,跨国际间的考古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这尤其得益于张光直先生于1970年代出版的《古代中国考古》,使西方学者逐渐了解中国史前史。他还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开设中国考古的专业课程,培养了不少优秀的中国考古教育人才,都致力于中国考古的教育与研究,为中美在考古学领域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此大背景下,西方不少高校也将中国考古纳入教学体系,逐步将中国考古推向全世界。很多关注中国史前考古的学者走入中国谋求合作,开展合作研究,促进共同发展,逐渐成为各方的共识并付诸实践。如以往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山东两城镇地区、洛河流域、成都平原都曾合作开展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项目。

2008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阿方兹教授联系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和寇岑考古学院的罗泰教授,希望能够由加州大学接手他经营多年的暑期培训班。后经在美访学的孙勇男研究员撮合,罗泰教授、叶娃博士、加州大学田野考古项目负责人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主要领导等反复协商,一致认为在陕西设立国际田野考古培训班的条件已经成熟,并得到了陕西省文物局的支持。2009年秋,三方达成合作协议,决定举办中美田野考古学校,并于2010年在杨官寨遗址启动了第一届田野考古培训班。为西方的本科生,特别是钟情于东亚人类学考古及文化或艺术史的学生,提供了来中国接受系统的实地学习和教育的机会,杨官寨田野考古学校填补了这一空白。

截至目前,该学校已成功举办十届培训班,在中美学术交流、学科发展、人才培养、人文交流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推动考古学理论方法互鉴

杨官寨中美田野考古培训班的成功举办,首先极大地促进了中西考古学理念、方法、技术的碰撞与互动,双方各取所长,起到了良好的学术交流效果。

杨官寨田野学校的教师队伍由双方遴选组成,美方负责人具有良好的西方考古学理论积累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经验,中方负责人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对于中国传统考古具有深刻认识。在合作教学期中,双方充分沟通、相互探讨,一致认为除了一般教学外,带领学生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与中国田野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们进行理论、方法、实践上的讨论与碰撞,才能起到真正的合作教育目的。

据此思路,在考古发掘中既注重按照层位和堆积单位进行发掘、收集遗存,及时采集各类样品,以考古发掘现场作为第一研究现场。同时以聚落考古、过程主义等理论为指导,开展一系列多学科研究方法、新兴科技手段的尝试,如地质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土壤微结构、陶器成分检测、陶片切片分析等,均获得了丰富的研究数据与结果,对传统考古学进行了有力补充,推动了杨官寨遗址的深入研究,对于综合分析杨官寨遗址所反映的史前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从田野考古到信息采集,再到科学研究和古代社会复原,杨官寨中美田野考古培训班都进行了有效结合和科学实践,建立了新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示范性案例,为推进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手段、研究等方面的革新提供依据。

联合培养考古人才

自2010年以来,已成功举办10期杨官寨中美田野考古培训班,先后培训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韩国、波多黎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10余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160多名学员,其中外籍学员达70余人。

中美田野考古培训班在每年的六月至七月间择期举办,为期5周时间,具体教学内容包括课堂教学、参观考察、田野考古、资料整理、综合研究、民俗调查及结业汇报等。课堂教学环节,授课时间约1周,主要聘请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专家教授,就中国考古学的一般理论方法、史前至周秦汉唐各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遗迹类型、器物特征等通识性课题进行讲解和传授,使学员们对中国考古学通论、陕西史前考古历史与现状、田野考古学操作规程、杨官寨遗址主要收获等有较为直观的认识。

田野考古实践是每期培训班最重要的内容,主要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开展现场教学,教学时间约4周。在开展田野考古现场教学的过程中,从布设探方开始,到辨识土质土色,判断遗迹及层位关系、科学收集出土文物、系统采集各类土样标本、堆积过筛、浮选,再到对遗迹现象进行详细的文字、绘图和照相记录、三维影像拍摄等,都是现场教学和实践的重点,使学员们对田野考古全流程操作实践,逐步掌握田野考古的基本规范和要点。

参与田野考古培训的学员,基本都是在读的本科生,还有一部分研究生和少数高中生,他们学习的专业比较多样,有人类学、艺术史、考古学、法学、经济学等等。经过田野考古培训班的培训和熏陶,有相当一部分学员对考古学有了更为直观和准确的认知,明确了自己对于考古学研究的兴趣,从而正式投入到考古专业的学习和工作中去。其中有很多学员后来又选择继续攻读考古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其中不乏北京大学、西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俄勒冈大学、亚利桑那大学、新墨西哥大学、波士顿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亚非学院、多伦多大学、莱顿大学等著名学府。学习方向主要有世界考古、东亚考古、中国考古、美术考古等方向,约40名学员最终选择从事考古行业。

杨官寨田野考古培训班不仅为对中国考古怀揣梦想和兴趣的学生提供了平台,同时,为中国考古、东亚考古研究领域积蓄了人才队伍。

发掘过程中,部分学员直接参与杨官寨遗址合作研究,在植物遗存研究、制陶研究、民俗调查等方面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在外文期刊发表,是从实践到深入研究的有效尝试和良好效果。目前为止,田野考古培训班学员们,结合杨官寨的材料,发表了多篇考古简报和研究论文,以及一些博士后出站报告,内容涉及考古资料分析、文化对比研究、古环境重建、环境形成过程等诸多方面。

这些成果都是基于中美双方的精诚合作,也与杨官寨考古发掘项目开放的国际化合作平台密不可分。

架起人文交流的桥梁

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产物,是民族核心凝聚力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依托着长达数千年的悠久文明历史底蕴,中华民族在其源远流长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传统文

化,并因此享誉国际。陕西是文物大省,也是历史文化最深厚的地方之一。在田野培训的过程中,设计了系统、丰富的考察参观计划,带领学员们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等通史类博物馆,以及陕西考古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周原博物院、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馆等专题类博物馆,让学员们参观学习连续不断裂的中华文明,不断深入接触、体验、了解中国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史前人类的打制石器,到精美绝伦的仰韶彩陶,石破天惊的陕北石城,还有鼎食鹿鸣的商周王朝,气势恢宏的秦汉帝国,无不浓缩了最精华的中华历史和文化。

通过中美国际田野考古培训这一国际平台资源,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传播和推介,中国考古先进的理念方法与重大发现逐渐走向世界,仰韶文化及其在中国史前史、文化发展、文明起源、城市起源中的价值与地位,将会得到更多关注。同时,中国考古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化影响力将会得到加强。

总之,通过杨官寨中美田野考古培训班的举办,中美考古学者之间敞开心扉相互交流,观察彼此的生活,了解对方的学科发展状况、学术风格、思维方式,有助于增进共识,相互借鉴,搭建两国考古学者之间的桥梁。为传播中华文明、传承中华文化、增进中美两国,乃至世界人民友好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临淄历史文脉悠长,春秋战国时期曾作为齐国都城长达800余年,1994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临淄文化遗存丰富,基建考古项目多,参与业务人员数量大。考古前置,即“先考古,后出让”,使土地部门在编制土地储备计划时,可以提前避开文物保护单位和不可移动文物点,大大缩短文物影响评估周期,让企业拿地即开工,最大限度减少在施工建设中由于发现文物造成的工期延误,缩短建设工期,助力经济建设。同时文物部门能在土地收储阶段提前介入,对现场进行保护,并组织开展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减少全面勘探的阻力,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如遇重大考古发现,也可以提前研判保留价值,制定保护措施,避免在土地出让、划拨后,因发现重要文化遗存而进行土地置换或政府回购,让文物保护工作更加灵活。

近年来,临淄地区始终坚持“考古前置”政策的实践探索。本文基于过去三年临淄区配合基建考古取得的成果和经验,遇到的困难进行总结,并提出解决方案,为今后考古前置工作的深入实施和持续优化提供保障,确保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并进。

近三年来考古勘探成果

2021年至2023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临淄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共完成246项考古调查勘探项目。2021年和2022年勘探有古代墓葬的项目均已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完毕,2023年勘探有古代墓葬的项目目前正紧锣密鼓地发掘中。经勘探发现临淄有175项古代遗迹,占总数的71.1%;71项有古代遗迹,这其中有27处为房地产项目,主要位于齐故城南部临淄区城市建成区中,是过去三年考古发掘的主要项目,其余主要服务工业建设、学校建设和乡镇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近三年来考古发掘成果

近三年来临淄地区配合基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三年中,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发掘面积至少93.7万平方米,发掘墓葬至少1.6万座、灰坑2096座、水井363眼等。主要涉及房地产建设、高速公路以及教育等公共服务事业,极大地缓解了地方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

新石器时期的考古发掘取得重点突破。最重要的突破便是发现了距今1.1至1.5万年的旧新石器文化过渡期遗存,命名为赵家徐姚遗址。该遗址核心区为一处距今1.3万年前后保存完整的人类活动营地。出土的夹灰磨光红陶表明该阶段人群已掌握成熟的制陶工艺,为研究制陶技术和陶器的起源提供又一实证,获得2022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新石器文化中晚期,最大的发现是北杨庄遗址和槐行遗址,为大汶口文化遗址。其发掘为研究鲁北地区大汶口文化的文化特征、聚落形态和生业经济提供了重要资料。龙山时期,近三年的基建考古并未发现规模较大遗址,主要零星地分布在几个遗址和墓地中,比如南马坊东南墓地、孙娄东街遗址和杨庄北遗址,并不是这些遗址的主要内函。

周代至汉代的考古发掘数量较大。近三年临淄区的夏商时期遗址少有发现,而两周至西汉时期遗存最多。临淄齐国故城是两周时期的齐国都城,也是秦代临淄郡郡治、汉代齐郡郡治及诸侯国齐国的都城。战国时临淄已发展为经济高度繁荣的东方大都会。位于齐故城南部的临淄城区遗址则成为这些年基建建设考古的重地,主要涉及齐故城周边的中小型聚落和

9月21日至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早期文明研究基地承办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对话——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在山西襄汾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就文明与国家的概念与标准、历史学、考古学视野下的文明与国家起源、世界古文明的起源过程、特性及其比较、中国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历程及其启示等四个专题展开讨论。

文明和国家起源是世界性热点课题,学者们在文明与国家的概念问题上有着精彩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徐义华认为,文明和国家概念要合理区分。文明指在社会发展复杂但以文明性为主导时,通过信仰、宗教和道德维系社会运转;而出现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把暴力演化为社会常规维持力量,即为国家阶段。陕西师范大学卢中阳谈到,国家作为理解文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应避免两个误区:既不能脱离公共权力简单基于血缘与地缘该国家进化历程,又不能与具体国家及物化标志简单对应入座。

与会发言中,考古学视野下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话题最为广泛,多结合国内重要考古成果溯源中国史前与早期国家形成历程。山东大学杜勇对“仰韶文化与黄帝时代”命题进行反思,认为“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遗址”观点从断代上分析是存疑的。丽水学院李岩提出,黄帝时代应该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五千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末期。龙山文化早期,前后一千年左右的时间。湖北大学魏继印从考古和文献相结合的角度,梳理出从仰韶时代中期到二里头时代中期地区国家形态的发展路径。山东师范大学燕生东认为,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是连续和稳定的。公元前2300年前后,海岱地区与中原文化区、甘青文化区首次形成“夷夏东西”对峙格局,延续整个夏代至商代早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春青结合严文明先生“重瓣花朵”理论,认为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特征最早应出现在庙底沟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寺考古队高江涛对陶寺遗址近年来考古发

齐故城南郊的临淄墓群。

近三年临淄地区考古体量最大的还是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考古,目前统计至少已发掘1.6万余座。其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南马坊东南墓地的发掘,该项目也成功入选2022年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南马坊东南墓地发现战国时期“甲”字形墓葬十余座,其中规模最大的M1003被专家推测其墓主为不低于上卿的齐国高级贵族。

汉代墓葬以小型墓为主,也有部分中型墓。按墓葬形制可分为:带墓道的砖室墓;土坑竖穴椁墓(一棺一椁);土坑竖穴墓(一棺无椁)。其中,青蓝府墓地M22就是临淄地区少有一座保存较好、规模较大的中型墓,该墓出土玉器83件、铜器18件、石器11件以及铁器2件。推测该墓年代应属西汉晚期。在M22南、北部还发现数座车马坑,车皆为双辕的明杠车。从整个车马坑内车马阵容看,前为导引车,中间为墓主人乘坐的主车,在主车东西两侧分别有一匹独马。主车后为小车随从。在导引车的马两侧还有人俑。在主车车舆有御马俑。由此推测该车马坑的车为仪仗出行用车,以上皆表现了西汉晚期的丧葬礼制以及墓主人的生前社会地位,对西汉晚期的用车用马制度和墓葬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汉以后山东地区古代政治经济中心先后转移至青州和济南,近三年的配合基建考古发掘中所见该处汉以后的遗迹现象较少。魏晋南北朝的遗迹几乎没有发现,很多魏晋墓有待进一步研究从汉墓中分离出来。隋唐时期的墓葬在各个遗址和墓地也只有零星发现,多为土洞墓或带墓道的小型砖室墓,应该为平民墓葬。宋元明清时期的遗迹现象也相对较少。

考古工作思考

虽说近年来临淄地区基建建设考古无论在配合地方经济发展、文物保护,还是发掘与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

考古工地的安全问题。战国至汉代的墓葬普遍较深,一般在三到四米,有的甚至十几米深,且很多墓葬积石、积砂。古墓葬富集区位于淄河冲积扇,多为湿陷性黄土,地下两米以下基本为砂质黏土,直立性不足,因此墓葬发掘深度一旦超过三米,墓壁就很容易发生侧滑倒塌。目前,各个考古工地主要是打支撑,扩大开口面,降低相对高差的办法,来降低危险系数。然而,这些多为经验性办法,急需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发掘深墓的应对办法。

业务人员严重不足。过去三年负责临淄地区勘探工作的主体为临淄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虽然该所已是山东省内区县级规模最大的考古研究所,但依然存在聘用人员队伍不稳定、人员青黄不接、经验丰富且技术过硬人员短缺等问题。

业务人员专业技能素质有待提高。考古前置政策下,考古勘探质量的高低,决定地下文物是否会得到应有保护以及后续基建项目能否顺利推进。过去多年,临淄地区的考古勘探主要为老队员对年轻人的传帮带,缺乏专门和系统的专业培训。

专项资金短缺。由于临淄区绝大部分土地为一级文物分布区,大部分项目用地必须经过考古勘探。但目前无论考古调查、勘探乃至后续发掘均无专项资金。2020年之前勘探和发掘均为企业出资,2021年之后由乡镇及街道办与考古单位对接并出资。但由于利益出发点不同,企业可能会存在不配合考古勘探,或对勘探的结果存在干涉的情况。

后期考古资料整理工作难度大。田野发掘仅是一个考古项目的野外部分,只发掘不整理、轻视研究等现象,不仅不利于田野技术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不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甚至可以说是文化遗产的破坏。然而,近三年来驻扎临淄的考古队几乎全年无休止地进行考古发掘项目,夏干三伏、冬挖三九。仅部分

掘成果进行了简要介绍,并从王规国家和礼制社会角度,提出了“陶寺模式”观点。河

南大学侯卫东认为,二里头时期已形成较为明确的央地关系,而与此相对应“陶寺文化区有没有出现明确的央地关系”这一问题还有待讨论。山东大学的王青就神农考古与早期中国做简要分析,认为我国上古时期盛行交感巫术,信仰万物有灵,这种原始神秘且不受逻辑规律支配的思维方式造就了早期中国的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毓灵针对殷墟王陵的始建年代、盗毁年代、祭祀年代以及王后墓等几个问题进行了梳

理,认为商王陵在周初曾经被大规模破坏,王陵安葬的是商王而没有王后墓,王后墓则按商代的居葬合一方式,死后埋葬于宫殿宗庙区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家瑞从中原史前房子的发展历程,研究回顾、总结展望三大方面,对以往研究进行总结,房址是考古学所发掘出来的重要人类活动遗存,房屋建筑技术、形态、布局等方面的演变是一个地区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方面。

相比于考古学,关于历史学视野下的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研究,则多与传世和出土文献材料相结合。河

南大学张立东认为,有文献记载的思想史意义上的“中国”应该在陶唐氏之地,即晋南地区。山东大学张伟以齐地八神祭祀为例,认为早期中国“俗”文化在面向国家之“礼”时,两者应是“礼-俗”双向互动共生关系。上海大学宁镇疆提出,以往出土及传世文献中谈到相关政治发生学或曰“政府”的主要特征内容时,往往突出强调调政治角色“治理”和“服务”的公共职能。北京师范大学谢乃和认为,酈公盂铭文内容上是一篇周人引古述今的三代早期王朝国家的“生成论”,揭示了夏商周早期国家形成过程是一种“以封建制为中心建构”的王朝国家模式。北京师范大学黄国辉认为,蚩尤应是炎帝族人,黄帝族与炎帝族为世代姻亲,“黄帝有子曰蚩尤”实际上应该是上古时期巨型亲属称谓制在后世的一种子遗记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牛海茹认为“合祭”的出现可能出于提高效率 and 节约祭祀材料的考虑,根据祭祀对象职能范围、祭祀目的和祭品需求等因素,将这些受祭神聚集在一起统一祭祀活动。

业务人员充足的队伍有能力快速整理出版发掘报告。临淄地下文物丰富,考古研究成果丰硕,还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和财力整理考古报告,并以此为契机建设齐文化研究和宣传的高地。

考古发掘项目完成后的验收流程审批时间长。每个项目考古发掘完毕后,须经省考古学会组织专家验收,然后形成验收报告,经过省文化和旅游局签字盖章后,由项目负责人出具考古完工报告,最后用地单位才可到相关部门取得土地的使用权,其间需要一个多月。

优化考古前置工作的系统性方案

优化资源供给。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公益性事业,其工作所需资金主要源于财政拨款。明确经费来源,要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前的考古工作所需费用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为实现考古前置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针对地方财政压力较大的现状,除了依靠地方财政,也可以筹集社会资金通过企业和个人捐赠等外部途径获取资金。这就需要向社会更广泛宣传政策的内涵和意义,为考古工作带来更多社会关注和支持。同时文物部门也应加强资金的支出管理,结合需求和效益分配资金,定期监控和分析资金的支出和使用,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益。

考古单位承担着考古前置政策中的主要工作量,一线考古工作者提升自身发掘工作能力,提高业务素质。考古技师队伍不仅需要增加人员数量,还需要通过一些措施提高技师稳定性和培养从勘探、发掘到资料整理的能

力。协调执行主体责任。地方政府应当引导部门间协同合作,通过培育政策执行主体之间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促使各有关部门能够认识到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并明确自身在考古前置政策执行中的职责。可以通过建立协调小组由牵头单位统一调配资源,简化基建考古审批流程,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推动审批服务便民化,加强部门之间的资源、信息的交流共享。

提升政策可执行性。考古前置政策是一项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文物保护的政策。各部门内部对于政策执行的考核也应进行汇总统一,进一步完善政策监管。后期监督是考古前置政策的有效运行的保障。因此,应从国家层面完善监督机制。

具体而言,首先需要从国家层面完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其次,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可将考古前置作为日常工作检查内容。另外,社会监督力量同样重要,可以适当组织志愿者介入后期的保护巡查工作。最后,通过推动考古前置政策纳入地方法规纳入法规体系,完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体制机制,增强政策权威性。

综上所述,今后临淄地区考古前置工作可通过地方财政和社会共同保障资金供给,加强资金管理,落实人员待遇,保障人才供给;加强部门合作和利益协调,创造更有利于政策执行的外部环境;通过细化考古前置工作标准,完善政策执行的监督管理提升政策的可执行性。

临淄地区的考古前置工作在过去三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还有效地保护了文化遗产。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经费不足、人员短缺、后期资料整理难度大以及验收流程审批时间长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优化资源供给、协调执行主体利益和提升政策可执行性的系统性方案。这些方案包括确保考古经费的来源,提高考古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简化验收流程,以及加强资金管理和政策监管等。希望通过这些措施,临淄地区的考古前置工作能够更好地平衡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利用,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作者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临淄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非局限于发掘中华文

明的历史价值,还应着眼于世界古文明的起源发展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洪庚从分析古代两河流域早期文字文献材料中出现的“美”的起源、内容和传播情况入手,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起源发展。

会议讨论还涉及近年历史学与考古学两个学科的学术成果回顾与梳理。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张敏谈到近年来考古学研究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与文明起源与发展中的延续性问题,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提炼与总结,科技考古、国外考古、边疆民族考古与公众考古等领域研究热度上升等三个方面。《中原文化研究》编辑李玲玲梳理了21世纪以来有关文明探索的文章,发现当前文明探索命题对于社会结构和文明机理,以及对中华文明形成机制的探讨愈发深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任会斌梳理了郭沫若先生从甲骨学到系统的社会形态研究的相关学术成果,及其在中国古史体系探索领域的学术贡献。

近年来,数字技术深刻影响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科技手段分析成果为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龙充充分运用同位素分析法,发现在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中,生业经济进行着对外来的物种和技术的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赵孝龙展示了部分甲骨材料的显微镜照射和测量数据,通过实验观察分析甲骨文各个阶段字体和契刻特征,这将为甲骨分期断代提供丰富的显微方面证据。

山东大学教授杜勇在会议总结发言中谈到,此次与会学者针对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的热点、焦点问题,热烈讨论,各抒己见。这种学术上的深入交流,恰恰体现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重要性,真正揭示早期文明面貌,展示文明的力量与前进步伐。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早期文明研究基地主任徐义华表示,重建上古史,需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共同努力。

会议期间,学者们考察了陶寺遗址考古现场,就考古与历史相结合的问题做了深入交流。本次研讨会贯彻长时段视野,论题涵盖史前文明研究的多个侧面,与当前学界关注的中华文明探索话题有着密切联系。会议上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积极讨论,分享学术成果和研究心得,强调了在深入发掘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和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过程中,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交流与对话的重要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